

· 医疗文化史研究 ·

期刊业兴起与民国时期中医验方 纂集和传布

李 剑

(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广州 510006)

摘要: 民国时期中医验方的纂集和传布借助期刊业的兴起, 呈现出有别于传统时代的新路径和新样式, 既有通过《丹方汇报》等期刊征集验方的新路径, 通过刊发《审查征集验方》整理、推广验方的地域性措施, 也有《中西验方新编》等融汇中西的新样式, 中央国医馆纂集《验方辑要》则可视为官方重视中医验方存续的表征。回顾民国时期期刊业兴起对中医验方纂集和传布的影响, 可进一步把握验方传统的近代演进轨迹和时代特点。

关键词: 中医; 验方; 民国时期; 期刊

DOI: 10.16307/j.1673-6281.2024.06.001

中图分类号: R-092; G23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4)06-0507-09

The Rise of Periodical Industry and the Coll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CM Proven Formulas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LI Jian

Basic Medical School,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help of the rise of the periodical industry, the collection, compilation, and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proven formulas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presented a new path and new pattern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traditional era. There were new ways to collect proven formulas through periodicals such as *Dan Fang Hui Bao* (《丹方汇报》*Compilation of Formulas of Elixirs*), and regional ways to sort out and popularize proven formulas through publishing *Shen Cha Zheng Ji Yan Fang* (《审查征集验方》*Examination and Collection of Proven Prescriptions*). There were also some new styles, such as *Zhong Xi Yan Fang Xin Bian* (《中西验方新编》*A New Compi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Proven Formulas*). *Yan Fang Ji Yao* (《验方辑要》*A Summary of Proven Formulas*) compiled by the Central Library of National Medicine, which could be regarded as a sign that the government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existence of TCM formulas. This study reviews the influence of the rise of periodical industry on the coll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CM proven formula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grasp

[作者简介] 李剑 (ORCID: 0000-0003-2896-7777), 教授; E-mail: tsglj@gzucm.edu.cn

th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s of proven formulas during the modern era.

【Key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ven Formul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Periodicals

民国建元后，期刊业蓬勃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医验方纂集和传布的重要途径。不仅中医类期刊普遍刊载中医验方，生活类、宗教类期刊亦纷纷跟进，1935年更出现了专门纂集、交流中医验方的《丹方杂志》。阎锡山治下的山西曾着力征集中医验方，并通过《医学杂志》公布甄审结果。中央国医馆对中医验方的“科学化”整理则成为此时期官方主导中医验方知识生产的注脚^①。民国时期兴盛的期刊业成为中医验方纂集和传布的重要平台，中医验方则是期刊业的促销利器，众多中医名家积极参与其中，形成独特的文化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一、西学繁盛背景下中医验方的纂集与传布

（一）验方汇编类图书的出版与发展

单方、验方是重要的中医药民间存在形式，具有价格低廉、能治疗特殊疾病或者起到特殊治疗效果的特点。验方指“有效验的方药”^{[1]70}，或见载于医书，或临床有效而流传于民间者，亦称偏方，以别于经方。单方专治某种疾病，通常药味简单。许多单方有确切的临床效果，亦属于验方范畴，因而，单方、验方常相提并论^[2]。秘方包含上述两类，唯因医家或个体掌握，秘不外传而已。“丹方”常与“单方”通用，如书名《丹方精华》《丹方大全》，俚谚“丹方一味，气死名医”，其实质均属验方^[3]。为便于叙述，本文将民国时期以“验方”“秘方”“单方”“丹方”为题者均纳入论题范畴，统称为“验方类文献”，重点又在期刊所刊载者。

鲍相璈《验方新编》问世后，累有官绅、医家增补、出版，并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各地；同时，借助于刚传入中国的石印术、铅印术，出版成本不断下降，次生出百余种版本，冠以“增广”“增订”“重订”“校正”等名号，成为出版业的宠儿，甚至出现了《验方新编》配图本和大字本，对民众日常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验方类图书的编印传统因此得以延续^[4]。

因应近代西方医学和中国报刊业初兴的环境，以及清光绪年间已经出现的中西医汇通言论，中、西医验方有了最初的汇聚，上海等口岸城市的中、西医业者推出中西医融合的验方集，一度对验方知识生产的内容和验方类图书的形态产生了影响。

近代藏书家丁福保兼通中西医学，主张会通中西，其所译数十种书籍中，便有西式药方及日本汉方。1910年，丁福保编成《中西医方会通》，由其主办的医学书局出版。该书采用功能系统分类法，分为呼吸器病、消化器病等10章，计128症，附以中、西药方1525首（其中中药方804首），充分体现了此期的时代特点。六年后，丁氏弟子顾鸣盛撰集的《中西合纂验方新编》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著名出版家杜亚泉曾专门撰文在《东方杂志》上热情推荐该书^[5]。这种融汇中西的验方类图书新样式，充分反映了社会风尚的变化，亦为中医知识的传播开一新面。至1927年，《中西合纂验方新编》已印行第10版，充分反映了文化名流加持的效应和当时社会文化对中西医融合式验方集受容。1926年，曾在日本习医的

① 相关研究见任宏丽等《民国期刊〈神州国医学报〉的办刊特色及社会影响》（《中医药文化》2012年第4期，第12-15页）、邱丽媛《民国设计批评视野下的〈机联会刊〉研究》（《中国艺术》2020年第4期，第20-30页）、朱建华《民国山西〈医学杂志〉整理及数字化研究》（山西中医学院硕士论文，2015年）及姚璐《中央国医馆之综合研究》（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余不赘录。专门研究的成果则尚未寓目。

陈继武所编的《中西验方新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38年5月已是第4版；1977年，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再版该书。同属此类者，尚有奚缙黄编，李子文校，新亚书局1931年出版的《中西合璧验方新编大全》。主流出版机构的参与也助推了这一风尚的形成。

与此同时，坊间流通量最大的仍是传统中医内容和样式的验方类图书。除以“验方”为名者之外，以“单方”为名者有《男女万病自疗法单方大全》《单方新编全集》等，以“秘方”为名者有《竹林寺女科秘方》《叶天士手集秘方》等，以“丹方”为名者有《丹方大全》《丹方精华》等，可见此时期验方类图书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二）期刊业兴起助力验方类文献的汇集与传播

近代中国期刊业的兴起与西风东渐有莫大关系。借助于不断兴盛的期刊业，中医界扩大了验方的流通和传播范围，使之成为期刊业的营销利器，是近代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据《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近代以“秘方”为题名的文献出现最早。随后的《益闻录》上，先后出现以“验方”和“丹方”为题名者。以“单方”为题名者则出现在1911年的《神州医药学报》上。这一阶段本土报刊业尚不发达，《教会新报》《益闻录》均有教会背景，与近代报刊业兴起的初始推动力有关^[6]。首篇验方类文献出现的时间及刊物详见表1，近代报刊以“单方”“验方”“秘方”“丹方”为检索词发表验方的情况详见表2。

表1 首篇验方类文献出现的时间及刊物

检索词	作者	题名	刊名	年份
单方	王帙青	单方集验选录	《神州医药学报》	1911年
验方	佚名	验方济世	《益闻录》	1883年
秘方	清溪钓徒	小儿免出天花秘方	《教会新报》	1874年
丹方	佚名	七液丹方	《益闻录》	1886年

注：以上数据引自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表2 近代报刊以“单方”“验方”“秘方”“丹方”为检索词发表验方情况

时间段	检索词			
	单方(篇)	验方(篇)	秘方(篇)	丹方(篇)
1816—1911年	—	16	5	1
1911—1949年	415	2 779	458	1 898

注：以上数据引自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1911—1949年，中医类期刊大量刊载中医验方。其中，刊载以“单方”为题名的文献最多的是《医药改进月刊》(38条)，刊载以“验方”“秘方”“丹方”为题名的文献最多的中医类期刊均为《丹方杂志》，分别为182条、63条、1 385条。《丹方杂志》因此成为民国时期“现象级”的中医期刊，与此对应的是，1930—1939年是民国中医期刊业最为兴盛的十年。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医业者仿照医学传教士的做法创办医学类期刊。1904年，周雪樵在上海创办《医学报》；1908年，何廉臣创办《绍兴医药学报》。此类期刊均主张“维新”，倡导“改良医学”，刊

载中医验方类文献的总数不足百条。《医学报》^[7]《通学报》^[8]等亦曾少量刊载验方类文献。

1911—1920年，中医业者注意到期刊蕴含的巨大能量，开始尝试利用这类信息渠道和网络。随着中医类期刊兴起，见于期刊的中医验方类文献大幅增多。《中西医学报》《绍兴医药学报》《神州医药学报》等自不待言，生活类、宗教类期刊亦纷纷跟进，刊载中医验方。

1920—1929年，以“单方”为题名的期刊文献增至51条，“秘方”56条，“丹方”18条，“验方”达367条。1921年创办的上海《中医杂志》，创刊号即刊载4则验方，办刊者显然将验方类栏目视为营销利器，当年已小有名气的沪南广益中医院^[9]和叶劲秋^[10]也乐于借此广大其声誉。随后，曹颖甫、丁仲英、沈仲圭、李健颐、秦伯未等名家也陆续在该刊发表验方，业界风习为之一变。中医类期刊纷纷设立验方类栏目，生活类、宗教类期刊亦积极响应。《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还刊发了本土牧师献出的验方^[11]。

据许晚成编《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不计“西康省”和“伪满洲国”，1936年国统区期刊（三日刊以上者）共1798种，1935年更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杂志年”。中医期刊大量涌现、验方类文献激增与中国报刊业的兴盛密切相关，相互促进^{[12][13]}。1930—1939年是民国时期验方类文献刊载量最多的十年，所有中医类期刊都设有验方类专栏，一些生活类期刊刊载的验方类文献数量甚至超过部分中医类期刊，科学类、现代医学类期刊也有涉足^[13]。这十年中，以“验方”“单方”“秘方”“丹方”为题名的验方类文献分别为2039条、267条、327条、1864条，总数达4497条。

正是在这十年，出现了《丹方杂志》《丹方汇报》等专门刊载验方类文献的期刊。《长寿》是上海创办的生活类期刊，在1911—1919年及1920—1929年的两个十年中，该刊刊发以“秘方”为题名者仅分别为19条及56条，1930—1939年刊发“验方”“单方”“秘方”为题名者分别为502条、327条、13条，总数达842条。如果验方类内容在近代中国报刊业最发达的上海经受不住市场考验，缺乏对读者的吸引力，很难想象《长寿》这十年刊发的验方比此前两个十年刊发总数之和还多出10倍。《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家庭医药常识》的情形相类。此外，沈仲圭、时逸人、陈存仁、王一仁、叶橘泉、杨志一等中医名家在此时期也非常活跃，除在中医期刊刊发验方外，也受邀给《大众医学月刊》等生活类期刊供稿，从而推动了期刊业的繁荣和验方类信息的社会传布。

1940—1949年，连年战争，经济凋敝，原办刊者星散各地，中医报刊业未能恢复元气，处境艰难。以“验方”“单方”“秘方”“丹方”为题名的验方类期刊文献分别有319条、86条、36条、13条，总数为454条，仅及上一个十年总数的一成。综上所述，期刊业从无到有、由盛而衰的过程中，所刊载的中医验方类文献也经历了从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同频转变，两者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二、中医验方收集、研究的新样式和新内容

（一）《丹方杂志》的兴起及其影响

由中医类期刊刊载验方类文献到创办验方类专门期刊，是民国时期特有的现象，其中以《丹方杂志》最引人瞩目，其创办者朱振声感叹西医蒸蒸日上而中医“毫无进步”，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医学进步的障碍，而丹方效力往往有不可思议者^[14]。在西潮汹涌的背景下，力求保全传统医学是当年中医业者普遍的心态，借势创办《丹方杂志》，则是独具慧眼之举。一直关注验方的张赞臣对朱振声此举颇多褒扬。他批评时方盛行，灵丹废弃，“每处一方，繁复至无方剂之眉目”，临证或以病试药，或以药试病，殊失古人临证制方要义，主张广搜博采，加以科学整理^[15]。

朱振声，浙江嘉善县人，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从丁济万游，勤于著述，曾主编《幸福报》，任《卫生报》编辑，有《内经运气辑要》《百病秘方》《丹方精华》《温病疫疠源流辑要》《家庭实用验方》

等行世，在中医界有相当影响。朱振声于1935年创办《丹方杂志》，至1938年第3卷第10期结束，共刊发1630条验方类文献。当时医家投稿非常踊跃，举凡丁福保、沈仲圭、张汝伟、谢香圃、尤学周、周莘农、李健颐、王肖舫、谢诵穆、叶古红、时逸人、张赞臣、汤士彦、陆渊雷、俞慎初、承淡安、宋爱人、陆士谔、叶劲秋等名家都曾在该刊发表验方，其中发表30首以上者有沈仲圭、尤学周、李健颐三人。该刊刊发的验方所涉病种繁多，既有治疗疟疾、梅毒、疥疮、霍乱、肺结核、红白痢疾、黑热病、脑膜炎、白喉（烂喉痧）、麻风等传染性疾病的验方，也有治疗中风、瘰疬、衰弱不孕、脱肛、便血、漆疮、肺痈、不寐、痛经、背疽以及戒烟、解毒、疗蛇伤等各科常见病的验方。1936年，朱振声所编《丹方精华》初集、续集由幸福书局出版，亦是该刊验方征集工作的成果。2013年，该书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再版，显现了当年验方收集的历史价值。

（二）官方支持下的地方性探索

1929年，时逸人赴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为阎锡山诊病，期间两人“商讨中医改进之周密计划”，认为挖掘民间验方既可保存妙方，又能活人治病，于是决定“先自征集验方、秘传针灸、秘藏医书等入手”，将征集民间验方的工作列为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重要工作^[16]。阎锡山随即命令山西省政府村政处全体村政实察员兼任“验方调查员”，在下乡履职的同时要征集民间验方、医书，并要求每周函告中医改进研究会；每过一地，所征得验方及医书之数目，随时呈报，不得延误^[17]。该会甄验所征集验方后，于1933年9月发行第一版《审查征集验方》，1937年5月再版，前后出版6集，集方6000余首。阎锡山专门为该书命序，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是民国时期地方政权支持开展验方征集工作的典型案例，验方集也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审查征集验方》为繁体竖排，32开石印本，每集500余页，其指向是“供家庭自疗和仓促无医，无力延医者”，选方以“贱、便、验”为标准^[16]。该书第1集，主要以《良方汇》（后证实为年羹尧编印的《集验良方》）为基础编撰，受原书影响，编辑体例较为混乱，有按中医临床分科者，有按症候分类者，共分为“中风门”等14门^{[18]2-9}。1934年出版该书第2集，主要收录由山西省政府村政处征集的验方，体例开始借鉴西医分科，分为26门^{[19]1-10}。《审查征集验方》第3集已完全按照西医分类编辑，分为内科、妇科、产科、小儿科、外科、皮肤科、花柳科、眼科、口齿科、耳鼻喉咽科、救急篇、杂集12科。在“内科”条目下，又按照西医疾病系统划分为传染病、时令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神经系病、循环系病、新陈代谢病、运动器病、泌尿器病、生殖器病类。

在山西省域征集验方的同时，中医改进研究会还通过《医学杂志》号召全国同业贡献验方。1936、1937年出版的《审查征集验方》第5集和第6集内容即由此而来，其中不乏张锡纯、周小农、傅仙坊等近代中医名家提供的验方^{[20]5}。

（三）中央国医馆“中医学术整理计划”中的《验方辑要》

民国“中央国医馆”成立伊始，即着手制定分期工作计划。随后公布的工作计划中，学术整理工作分为3期，即制定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及“新辑标准作品与各种专著之征集”^[21]。1934年初，中央国医馆延聘陈无咎、周柳亭、郭令之、随翰英、黄谦、张忍庵、何季海、萧君绛等为编审委员会委员，实施中医学学术整理第三期计划，并决定从整理《验方新编》入手。

中医界对中央国医馆此举普遍寄予厚望，认为《验方新编》确实收载许多经验妙法，“惜乎叙述疾病，既欠明了；而于验方之下，又无理解，殊觉未臻完善，实有审定之必要也”^[22]。张治河甚至提出了“假定编辑《验方新编》方式”，供编审委员会采择，其取向模仿西式做法甚明^[23]。周柳亭提出，对唐宋以下各方书的整理，力度要大，“其古籍字句错脱者，则增补；一书前后矛盾者，则修正；他书互相攻击

者，则删除；古方不适今病者，则重为加减。他如病理与西方学说可以汇通者，则援引对照，旁搜博采。务期成为有系统之医籍，‘完全进于科学化之阶梯’，以供世界医学之研究，而‘开古今中外医学大冶于一炉之新纪元’也”^[24]。

《验方辑要》是中央国医馆编审委员会编审的医药丛书之二，取材于李克蕙《国医的科学·药理篇》、叶橘泉《合理的民间验方》、蒋仲翔《丹方辑异》和《丹方汇报》等，《验方新编》亦是参考文献，但并非重点。该书以脏腑官能病分科，通行病名列于子目，如内科分为传染病（霍乱、鼠疫、麻风）、神经系统疾病、循环器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泌尿生殖器病、腺病（瘵气）和新陈代谢病（消渴、肥胖病），另有外科、妇科、幼科、五官器病以及解毒急救，共分75症，每症之下列方若干，共收载680方，方后分列药味、服法、制法、应用范围，部分验方并列有实验、兼用、功效证明、来历、附录等项，介绍颇为详细。如该书收载的回生起死丹（活土鳖虫、自然铜、乳香、陈血竭，朱砂、当门子）能治跌打、金创等症，据称曾在“八·一三”淞沪之战中用于救治伤员，屡获奇效^{[25]485-486}。

三、社会新形态下中医验方传布的特点

除了利用近代期刊实现传布中医验方、交流使用或实验经验信息的流通功能外，中医界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不断推动中医验方的传布和研究，呈现出一些特点。

（一）借期刊征求和传布中医验方

从借助期刊征求验方、寻方问药，到期刊开设验方类专栏，进而出现专门的验方类期刊，是民国时期验方和期刊受到业界重视的表征，也是有别于传统时代的新业态。

征求验方，最早见于1919年《广济医报》^[26]。随后出现的《绍兴医药学报》也曾刊发征求疡科、儿科良方的启事，并得到从业者的回应，该刊由此成为验方交流的有效平台^[27-28]。这种颇具时效性的供求信息流通方式让人眼前一亮，此后不乏效仿者。1923年，刘叔莼在《镇江医学公会月刊》及《江苏全省中医联合月刊》发表《征求验方启》，呼吁海内同业将确有效验的内外治验方及药品刊发于该刊^[29-30]。同年，杨燧熙在《医学杂志》上征求妇科著作^[31]。1924年，主持《三三医报》的裘吉生呼吁各地同业，“诸君有所验，请速披露本报，俾便救人为幸”^[32]。刚刚崭露头角的张赞臣，次年在《三三医报》连续刊发9期《征集验方启事》^①，征集验方之余，也为他随后创办《医界春秋》赢得了业界关注。身处马来西亚的赵国廉亦曾在《医界春秋》上征求验方^[33]，以期借助国内业者的力量应对当地常见疾病。

中央国医馆也曾分函各省政府，请各该省政当局调查搜罗民间秘传单方，俾便编辑成册，以免失传^[34]，业界应征者颇不乏人^[35]。《国医公报》亦刊载验方类文字，唯其更强调科学性。如杨子钧介绍“赤小豆治产后小腹痛”，病理、植物科属等悉取西医及欧洲植物分类法，功用则中西杂糅，间引古籍所载^[36]。中医改进研究会借助山西《医学杂志》征求验方，其结果构成了《审查征集验方》第5、6集的主要内容。注重科学性、吸收西方植物学的内容是其明显特点。

“公开秘方”，是民国期刊上的另一个高频词组，最早见于1929年^[37]。20世纪30年代，“公开秘方”从成为话题到成为业界共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世相的变化。许多中医期刊都设有“公开秘方”专栏，渐及生活类期刊。抗战时期，兵燹连年，医药匮乏，中医业者则公开疗治战伤的秘方，以救国难^[38-39]。此举借由期刊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产生了影响，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中医政策中，就包

① 见张赞臣《征集验方启事》（《三三医报》1925年第8期，第10页），同样的启事，亦见于该刊1925年第9、12、13、14、16、27、29、30期。

含号召业者“公开秘方”的内容。

宗教团体和行业团体施印验方集，也借由期刊加以推广。《崇善》主办者曾编印《冬令实用验方》2 500册施赠各处，其中八大时令验方及家庭简效方，均为海上名医谢利恒、秦伯未、方公溥等屡试屡验的良方^[40]。当年颇负盛名的“天虚我生”^①也曾发起印送千册《梅氏验方新编》，借《机联会刊》广而告之^[41]。

（二）及时总结应对新发传染病的有效措施

1816—1949年是各种烈性传染病肆虐的历史时期。除天花、疟疾等古老的传染病之外，白喉、流脑、霍乱、流感等传染病在19世纪相继传入我国，造成极大危害。顾鸣盛《中西合纂验方新编》将传染病置于卷首，即源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医界在应对新发传染病的过程中，即时总结诊疗经验和有效方药，并借由期刊交流验方，在疫苗和特效药物尚未普及之前，发挥了重要的治疗和预防作用。

《南洋官报》^[42]和《湖北官报》^[43]开办早期即传布治疗传染病的验方。借助于官报传布验方的做法，民国时期仍有续闻。如为应对广州霍乱疫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就曾号令民众，介绍验方^[44]。抗战期间《浙赣月刊》也曾登载验方，应对人群流动产生的流脑疫情^[45]。

当年刊载治疗时疫验方的，既有《杏林医学月报》《医药改进月刊》《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增刊》等中医类期刊，也有生活类期刊如《家庭常识》^[46]《大常识》^[47]《家庭医药常识》^[48]，以及宗教类期刊《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49]《弘化月刊》^[50]。可见当时传染病为祸之烈、社会各阶层关注程度之高。

以霍乱为例，当年广州霍乱流行期间，西医仅有内服生理盐水，次服碘剂，再以1/16碘酒注射的对症疗法，或注射生理盐水与内服乳酸钠，他无良法妙药^[51]。中医治疗以蚕矢汤应之，“十之八九药到回春”。据称广州乐善好施者“已将此方印刷散派，并劝告仁人继起印送，俾众咸知”^[52]。近代报刊帮助这类验方迅速传播，的确有益于疫情防控。长江三角洲地区霍乱曾数度流行，1883年，常州琴川中医业者即献出验方，登载报刊，地方绅商按方配药，施济贫病，确有因此受益者，据称验方“传送各处，病者无不立愈”^[53]。《杏林医学月报》等中医期刊自然不甘后人，编发霍乱专号，刊载治疗霍乱验方^[54]。

（三）中医业者的积极探索

传统社会的验方研究和传布，向分官私两端，民国时期亦复如此。其中，叶橘泉的案例颇具代表性。早在悬壶之初，叶橘泉便留意民间验方，并邀集同好搜集和研究。他先在《大众医学》等刊发表验方，后由该社结集出版，便是他的处女作《合理的民间良方一百则》。叶橘泉重视民间验方的实际价值，一生致力于民间验方和中药的研究。他强调“实验”，从文献、临床实效和药理等方面深入研究，与章太炎所倡导的“取法方东，不震远西，下问铃串，不贵儒医”颇相吻合^[55]¹³。

1935年，叶橘泉邀集中西医业者50人发起国药丹方实验研究社，并创办《丹方汇报》。该刊不设其他栏目，专事收载各地同业函寄的中医验方，发布社员就某验方的“实验成绩报告”^[56]，或就验方、中药相互切磋^[57]。其社员有国内各业人员^[58]，亦有远在马来西亚柔佛州者^[59]。该刊共刊出29期，收载361首验方。该刊发布验方，每方赋一编号，涉及临床各科及白喉、流感、流脑等传染病，甚至有预防传染病的验方^[60]。1936年1月，叶橘泉《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6集）出版，获得中西医界的普遍赞誉。郭若定认为，该书“用科学分析参证之法，将国药处方真义，一一详为阐发，是其贡献于世界医学者至宏”^[61]郭序。从该书自序中，或可见叶橘泉之心迹：“著者生平治医的宗旨，理论则悉宗科学新说，治疗则采用国药古方……采中药疗法之特长以弥补西药治疗不完备的缺憾。一以俾西医知所利用国药处方，一

① 即陈栩（1879—1940），字栩园，又字蝶仙，近代著名作家、实业家。参见（美）林郁沁《美妆帝国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上海：光启书局，2023年）。

以冀中医知病原、病理的真相。从此破除隔阂，不仅中西医界免去冲突，且可双方携手互相探究。”^[61]自序该书病名、分类悉采西医，内容则中西兼采。叶橘泉持续开展方药研究，以图融通中西医药，后来他出版了《实用经效单方》《现代实用中药》等书，成绩斐然。

处在汹涌西潮中的民国中医界，除了延续传统样式，继续扩展验方图书的覆盖面外，还借助于期刊业的兴起，为中医验方类文献觅得新的传播平台，中医验方类文献则反过来成为各类期刊的营销利器。其中，既有期刊营销的考量，亦有验方类文献在口岸城市和内陆省份普遍受到重视的原因。《丹方杂志》等专事中医验方纂集和传布的期刊，也是迄今所见最具代表性的个案。沈仲圭、叶橘泉、徐相任、张赞臣、时逸人、陈存仁等众多名家积极参与其中，为各类期刊供稿，共同营造了包括中医类期刊在内的期刊业长达10年的繁荣，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与此同时，融汇中西的验方图书成为那个时代口岸城市特有的产物。丁福保等合编中西验方的做法，改进了验方类知识的生产方式和内容；杜亚泉等知识界名流的褒扬，为验方类知识的存续赢得一线生机的同时，验方传统随着时代变迁衍生出新的样式和内容。

实际上，民国初期中医类期刊的创办者大多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中医已经落后于时代，须加以改良，验方类文献起初并未受到重视；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医业者显然更加善于利用期刊业兴盛带来的红利，他们对于验方类文献接纳程度的变化，反映在这一阶段中医类期刊刊发此类内容的数量上。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医科学化”逐渐成为业界主流意识，时逸人、叶橘泉、张赞臣等业界领袖以及任职中央国医馆的中医界贤达在20世纪30年代都更加认同，须对包括《验方新编》在内的传统样式的验方文献进行“科学化”整理，从而在此类知识的生产和传布方面找到了暂时的平衡点。

参考文献

- [1] 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中医药学名词 [G]. 北京: 科技出版社, 2005.
- [2] 黄鑫, 黄涛, 黄华. 经世致用: 仍主宰着近代中医方书的发展 [J]. 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28(12): 67-68.
- [3] 鲁斐然. “丹方”与“单方” [J]. 江西中医药, 1953(2): 66-67.
- [4] 刘希洋. 中国近代大众医学读物的传播与接受: 以《验方新编》为例 [J]. 史学月刊, 2020(5): 85-99.
- [5] 杜亚泉. 《中西验方新编》叙言 [J]. 东方杂志, 1916, 13(11): 23-25.
- [6] 孙潇, 姚远, 卫玲. 《益闻录》及其自然科学知识传播探析 [J]. 西北大学学报, 2010, 40(1): 172-176.
- [7] 佚名. 仙方照录 [J]. 医学报, 1909(112): 1.
- [8] 凌昌. 经治验方 (录医学报) [J]. 通学报, 1906, 2(8): 217-218.
- [9] 沪南广益中医院. 疥疮神效方 [J]. 中医杂志, 1921(1): 79.
- [10] 叶劲秋. 经验秘方 [J]. 中医杂志, 1921(1): 77-78.
- [11] 知白子. 刘德生牧师之验方 [J]. 通问报 (耶稣教家庭新闻), 1927(1234): 16.
- [12] 李焱胜. 中国报刊图史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 [13] 杜席儒. 孙真人治时疫奇验方 [J]. 中央医学杂志, 1937, 1(2): 21-22.
- [14] 朱振声. 自序 [J]. 丹方杂志, 1935(1): 1-2.
- [15] 张赞臣. 张序 [J]. 丹方杂志, 1935(1): 1-2.
- [16] 刘洋, 张培富, 陈显久. 近代首部官版验方汇编: 《审查征集验方》 [J]. 中华医史杂志, 2017, 47(3): 31-36.
- [17] 佚名. 本会验方调查员应行注意之事项 [J]. 医学杂志, 1937(95): 4-5.
- [18] 中医改进研究会. 审查征集验方: 第1集 [M]. 太原: 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 1933.
- [19] 中医改进研究会. 审查征集验方: 第2集 [M]. 太原: 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 1934.
- [20] 时逸人. 审查征集验方第六集序 // [M] 中医改进研究会. 审查征集验方第六集. 太原: 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 1937.

- [21] 佚名. 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分期工作计划书 [J]. 国医公报, 1932(1):25-28.
- [22] 张治河. 审定《验方新编》之我见 [J]. 医学杂志, 1935(81):40-41.
- [23] 张治河. 审定《验方新编》之我见 [J]. 医界春秋, 1934(95):21-22.
- [24] 周柳亭. 中央国医馆整理《验方新编》之感言 [J]. 医界春秋, 1934(93):7-8.
- [25] 甄志亚. 中国医学史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
- [26] 尹文博. 征求生乳验方 [J]. 广济医报, 1919,4(6)64.
- [27] 高德僧. 答兰溪方肇元君征求千日疮验方 [J]. 绍兴医药学报, 1920(16):8.
- [28] 林荫祥. 答兰溪方肇元君征求婴孩百二日内诸疾验方 [J]. 绍兴医药学报, 1921(55):4.
- [29] 刘叔莼. 征求验方启 [J]. 江苏全省中医联合月刊, 1923(15):2-3.
- [30] 刘叔莼. 征求验方启 [J]. 镇江医学公会月刊, 1923(4):1.
- [31] 佚名. 杨燧熙征求妇幼科验方著作 [J]. 医学杂志, 1923(16):89.
- [32] 佚名. 征求验方启 [J]. 三三医报, 1924,1(18):2.
- [33] 赵国廉. 征求验方 [J]. 医界春秋, 1933(77):37.
- [34] 佚名. 中央国医馆调查秘传单方 [J]. 图书展望, 1936(11):90.
- [35] 佚名. 张星五汪友松各呈中央国医馆征集验方 [J]. 光华医药杂志, 1936,3(10):65.
- [36] 杨子钧. 释民间实验方 [J]. 国医公报, 1935,2(4):91-93.
- [37] 邰家骊. 公开四个外科秘方 [J]. 卫生报, 1929,1(90):9-10.
- [38] 泽霖. 炮火伤及取子弹之秘方公开 [J]. 广东医药旬刊, 1941,1(4):15.
- [39] 刘灼鑫. 公开研究取枪弹破片之秘方 [J]. 广东医药旬刊, 1942,1(8):38-39.
- [40] 佚名. 本会赠送实用验方 [J]. 崇善, 1931(78):28-29.
- [41] 佚名. 天虚我生发起印送梅氏《验方新编》 [J]. 机联会刊, 1934(100):6.
- [42] 佚名. 盛京将军咨江督文 (为疮疽症流行拟配罗天鹏军用验方事) [J]. 南洋官报, 1907(77):77-78.
- [43] 佚名. 附刊治疫验方: 邮传部刊送医生周开丰治百斯脱症经验方 [J]. 湖北官报, 1911(23):12-14.
- [44] 佚名. 总司令部颁发治霍乱验方 [J]. 广东医药杂志, 1926,1(3):82-83.
- [45] 姚其源. 小儿急慢惊风及脑膜炎之病理与验方 [J]. 浙赣月刊, 1941,2(4):33-34.
- [46] 天虚我生. 时症验方 [J]. 家庭常识, 1918(7):68.
- [47] 明政. 梅毒验方 [J]. 大常识, 1930(201):1.
- [48] 郑春风. 戒绝鸦片烟之简效方 [J]. 家庭医药常识, 1933(8):25-27.
- [49] 黄士侠. 防免喉疫实验方 [J]. 通问报 (耶稣教家庭新闻), 1923(1041):16.
- [50] 佚名. 鼠疫验方 [J]. 弘化月刊, 1942(10):29.
- [51] 佚名. 西医之处治霍乱症 [J]. 杏林医学月报, 1932(41):33-34.
- [52] 佚名. 纱尿治霍乱应验如神 [J]. 杏林医学月报, 1932(41):33.
- [53] 佚名. 验方济世 [J]. 益闻录, 1883(295):455.
- [54] 佚名. 治霍乱之种种良方 [J]. 杏林医学月报, 1932(41):31-33.
- [55] 吴新华, 刘小湄. 中医学大师叶橘泉传 [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92.
- [56] 佚名. 社员报告实验成绩: 第九号方 [J]. 丹方汇报, 1935(5):1.
- [57] 叶华林. 答江西社员熊梦君 [J]. 丹方汇报, 1937(25):1.
- [58] 熊明之. 庐山植物园熊明之社员来函 [J]. 丹方汇报, 1937(28):1.
- [59] 佚名. 社员报告实验成绩: 第四三号方 [J]. 丹方汇报, 1936(14):1.
- [60] 王叔和. (一二六) 预防白喉方 [J]. 丹方汇报, 1935(9):1.
- [61] 叶橘泉. 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 上 [M]. 吴兴: 存济医庐出版, 1936.

(本文编辑 黄晓华)